

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 史学论稿

李颖科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 史学论稿

李颖科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史学论稿 / 李颖科著. —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 - 7 - 5604 - 3810 - 8

I. ①春… II. ①李…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春秋战国时代 ②中国历史—研究—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K225.07
②K23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4327 号

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史学论稿

作 者: 李颖科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

邮 编: 710069

电 话: 029 - 88303593 8830259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5.5

字 数: 272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04 - 3810 - 8

定 价: 98.00 元

自序

乍一看这个书名,似乎有些莫名其妙。跳过秦汉论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确给人一种不合“常理”的感觉,但这正是我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涉足中国史学以来,重点研究的两个历史时期的史学成就。也许在别人眼里,这是“不循正路”或“别出心裁”,但这毕竟是我真真正正走过的学术研究之路,窃以为是一种另辟蹊径的选择。

1979年,我考入西北大学时,所学的是冷门考古专业。与其他专业相比,考古专业外出参观学习的机会较多,这对我这个在农村长大、从未外出过的农家子弟来说有一定的吸引力。记得当年填报高考志愿时,在西安工作的姐姐问我有何意向时,我不假思索地说,只要所学专业能多出去逛逛就好。故而第一志愿填报的就是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入学后,随着围绕考古专业阅读相关历史文献典籍,我慢慢喜欢上史学史这个专业,以至于大学毕业时学士学位论文选题也确定为史学史专业范畴的《论〈吕氏春秋〉的编纂体例》。幸亏当时对专业与毕业论文选题的一致性要求不是十分严格,否则我能否顺利毕业都成问题。

1983年我大学毕业,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汉唐典籍专业攻读硕

士研究生学位,师从西北大学兼职教授李学勤先生研读古代文献典籍。李先生当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主要在北京工作,故学校指派历史系柏明教授任我的研究生副导师。柏先生一直从事史学史研究。基于我对史学史的兴趣,加之柏明先生的指导,在日常对历史文献典籍点校研读过程中,自然更多地关注作者在历史编纂学和史学思想方面的优劣得失,久而久之便把自己的研究方向、重点放在史学史和文化史领域。1984年,我在《西北大学学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孙盛史学初探》。1986年研究生毕业时,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紧扣史学史专业,以论述《搜神记》作者干宝的史学成就《干宝之史学》为题写出毕业论文,并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

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后,我的教学和研究主要在史学史和文化史领域。就我国史学史研究来说,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学界更多研究的是大一统的秦汉和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史学成就,发表出版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而对先秦特别是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这两个分裂动荡、战乱迭起的历史时期的史学发展关注甚少,研究成果寥寥无几。毋庸置疑,秦汉和唐宋元明清时期,尤其是汉唐两代,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社会稳定,相应地,史学大家辈出,史学名著继起,史学成就显著,为推动我国古代史学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史学研究需要秉持全面客观、辩证统一的观点和立场,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上发生的一切,既不苛求古人,亦不抑恶扬善。唯有如此,才能准确公正地得出经得起历史推敲和实践检验的结论。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先秦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史学发展打下的根基,难道会有秦汉特别

是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的史学成就？同理，如果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发展，难道会有唐宋及其以后的史学盛况？就拿魏晋南北朝来说，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大约三百年的分裂。在这漫长的分裂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但与此同时，伴随着旧的思想桎梏的解除和思辨哲学的发展，各种知识和信仰交相辉映、互相影响，中华文明呈现出空前的思想自由、文化繁荣的景象。相应地，史学发展也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时期，主要表现为：一是史学范围扩大，史籍数量众多，“一代之史，至数十家”^①。二是史书体裁多样，国史、家传、别传、杂传、地志、记注、谱牒等异彩纷呈。三是史注、史考之风盛行，史评、史论活动活跃。四是史学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发展成为独立的乙部之学。总之，在史书编纂和史学思想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两晋六朝，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②正是这辉煌的史学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和作用。不可否认，隋唐以来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诸多成就与传统，都可以在魏晋南北朝史学中觅得根由与端倪。

正是基于这一学术研究的拷问，我把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这两个中国历史上战乱动荡的历史时期，以求实创新的学术态度研究其史学成就。

我首先从魏晋南北朝史学入手，一方面，在横向上选取不被学界重视或很少有人研究，但又的确颇多学术创新并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及其史著作为典型个案进行深入考察，先后就孙盛与《晋阳秋》、干宝与《晋纪》、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刘孝标与《世说新语注》

① 《隋书·经籍志》。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25页。

等,做出比较全面系统的探索性研究,有些学术成果填补了学术研究空白,有些学术观点发前人所未发。比如,长期以来,学界始终认为,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是评论我国史学的第一篇专论,更有人提出它开我国史评之先河。而事实并非如此。我在研究中发现,远在刘勰之前约两百年,东晋史家干宝曾撰《史议》,从史书体裁、编写体例、叙事手法等方面评论各家史书的优劣得失。应该说,《史议》才是我国史学评论史上第一篇专论。如果将干宝《史议》、刘勰《史传》和唐刘知几《史通》纵向联系做一考察,可清晰地勾勒出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我国史学评论发展的轨迹和脉络。再比如,众所周知,南朝宋裴松之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其所撰《三国志注》内容宏富,考证精审,独具特色,具有十分重要的史学价值。长期以来,学界围绕该注从史籍注释、史学考证、史学评论等方面,对裴松之的史学成就多有研究。然而,关于裴松之的史学思想,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无人探讨,这直接影响到对这位历史学家史学成就的全面总结与评价。我钩沿古史,从进步的社会历史观、讲求务实致用等四个方面对裴松之的史学思想做了比较全面客观的论述,填补了这方面的研究空白。

另一方面,我从史学发展的纵向角度,对魏晋南北朝史学内容构成的重要方面如史注、史考、史评、史论等,分门别类地做了深入细致的考察论证,撰写了《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考据》《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籍注释》《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评论》《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事评论》一组四篇论文。其中,既客观地映示出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趋向、脉络与特征,又重点阐释了其在上承秦汉、下启隋唐以降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尤其是对这一时期在

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表现出的精要之论、创新之举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在此基础上,我先后撰写了《魏晋南北朝历史编纂学简论》《魏晋南北朝史学思想简论》两篇文章,从历史编纂学和史学思想两大方面对魏晋南北朝的史学成就做了比较全面的概括与论述。

在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研究告一段落之后,我开始研究春秋战国史学。我先后以中国史学的起源、孔子与中国史学、吕不韦与《吕氏春秋》为切入点进行研究。

关于中国史学的起源。研究中国史学特别是先秦史学必须首先弄清楚它的起源。就文献记载来看,在我国历史上,最早探讨史学起源者为东汉时期著名史学家班彪、班固父子。班氏父子将史学起源追溯至唐虞三代文字产生和史官出现之时。这一史学起源论为后世史家所承袭,如南朝梁刘勰、《隋书·经籍志》,现代著名史学家金毓黻、杨翼骧等,均是如此。尽管各家的论证各有侧重,但基本上都是以文字、历法的产生和史书、史官的出现为依据,将中国史学起源追溯到上古三代。其实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第一,尽管史学包括史书和史官,探讨史学的起源必须涉及史书和史官,但史学毕竟不同于史书和史官。所谓史学的起源,是指史学作为一门完整学科的形成。这也就是说,史书或史官的出现并非史学的起源。第二,各家认为文字出现之日就是中国史学起源之时,这也是难以成立的。诚然,史书要用文字来编写,但文字的最初出现,并不必然意味着史书的产生,更不能必然说明史学的起源。第三,各家在谈及文字的同时,尽管也注意到史书和史官等这些史学本身的方面,但都没有深入到史学内部,从历史编纂学和史学思想等方面来探讨中国史学的起源。第四,各家所说的文字、历法、史书和史官,既是

们衡量中国史学起源的标准或依据,同时又是他们衡量中国史学起源的标志。换言之,在他们的心目中,衡量的标准和标志是同一的。毋庸置疑,这犯了一个明显的逻辑错误。不可否认,标准与标志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联系或者说是相通的,但两者毕竟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第五,把中国史学的起源界定在漫长的上古三代,本身就是一种不科学的结论。因为史学的起源固然不像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那样在较短的时间即可完成,但也决不会如此漫长。正是基于这些认识,我撰写了《论中国史学的起源》一文,以历史编纂学和史学思想为标准,以历史编纂学和史学思想体系的基本形成作为标志,将中国史学的起源界定在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其标志是《春秋》和《左传》的完成。

关于孔子与中国史学。自我涉足中国史学,尤其是先秦史学以来,逐渐形成这样一种看法:孔子在思想史和教育史上的成就,遮掩了他在史学史上的建树。这正像柳宗元一样,尽管他在中唐史坛上相继撰写出《贞符》《封建论》《天说》《天对》等一批历史理论方面的杰作,并以此为标志形成唐代史学在史论发展史上的高峰,但由于他在中唐文坛上的杰出贡献,致使人们只知道作为文学家和诗人的柳宗元,而很少了解作为历史学家的柳宗元。或许正是因为这一原因,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孔子当作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进行研究,而很少有人把他当作伟大的历史学家对其史学成就进行探讨。尽管早在清朝和近代,章学诚和章太炎曾极力主张,孔子在中国历史上主要以史学家现身,但直至20世纪90年代,学界同仁并未予以珍视。毋庸讳言,这是一个被我国历史学界长期忽略的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从史学的观点来看,孔子的撰述及其

史学活动,实乃先秦特别是春秋战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还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后世中国史学的发展。且看孔子及其《春秋》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影响。司马迁对孔子所撰《春秋》推崇备至。《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在这里,司马迁把《春秋》作为“是非”的权衡、“王道”的纲领和一切人“通权达变”的指南。它代表一种法制,是禁于未然的法制,这也就是礼。一句话,在司马迁的心目中,《春秋》是礼义的根本大法的例证和实施。正是因为司马迁如此看重《春秋》,所以《春秋》的著述例则也就自然成为《史记》着力效仿的对象。只要把《春秋》和《史记》做一对读,即可发现,《春秋》的微言大义为司马迁所吸收,以作为其《史记》的神髓。诚如章学诚所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学耳。”^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没有

① 《文史通义·申郑》。

孔子及其《春秋》，也就不会有举世闻名的《史记》，《春秋》是《史记》的灵魂。我如此说，丝毫无意于贬低司马迁作为中国史学之父对中国史学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只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研究中国史学，不能只看到司马迁的伟大建树，而忽视或淡化孔子的史学成就。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史界学人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这样一种习惯：一谈及中国史学的辉煌成就，就像条件反射似的马上联系到司马迁，正如同一说到西方史学，便会立即言及希罗多德一样。作为中国史学之父的司马迁和作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似乎已分别成为中、西方史学成就的代名词。尤其是一旦将中西方史学试做比较，人们每每以司马迁和希罗多德为基点，其结果必然是中国史学在很大程度上优于西方史学，因为司马迁比希罗多德在生活时代上晚数百年，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后来居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十分偏颇的做法。如果我们将孔子和希罗多德这两位基本上处于同一时代的东、西方历史学家做一比较，也许能够十分确切地映示出中西方史学的共性与特性，以更好地揭示历史学发展的普遍规律。事实上，孔子确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对中国史学做出了许多富有开创性的贡献。为此，我先后撰写了《孔子与中国史学》《论孔子的史学思想》两篇论文，后来又出版了《孔子与中国史学》一部专著。

关于吕不韦与《吕氏春秋》。《吕氏春秋》一书为秦相吕不韦及其门客所作。尽管该书问世以来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影响很大，但学界对吕不韦及《吕氏春秋》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成就与贡献却论之甚少。究其原因：一方面，自《汉书·艺文志》将《吕氏春秋》著录于诸子以来，其一直被视为子部杂家类著作，故其史学成就不被世人所重视；另一方面，历史上对吕不韦其人的评价总是颇有微词，梁启

超对吕不韦的评价足以说明这一点：“吕不韦不学无术之大贾，其著书非有宗旨，务炫博哗世而已，故《吕览》儒、墨、名、法，樊然杂陈，动相违忤，只能为最古之类书，不足以成一家之言，命之曰杂，固宜。”^①这种因人废言的偏颇之举，直接影响着对吕不韦及其《吕氏春秋》史学成就的客观评价。事实上，《吕氏春秋》是一部道地的史书。该书《序意》篇述其编纂意图为：“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纪治乱存亡”“知寿夭吉凶”，这正是我国传统史学所孜孜以求的撰史目的，所以冯友兰《吕氏春秋集释·序》说：“然此书不名曰《吕子》，而名曰《吕氏春秋》，盖文信侯本自以其书为史也。”早在汉代，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即明确指出：“吕不韦，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司马迁认为，吕不韦自认其书包罗天地古今万物之事，事取获麟，踵事春秋，故以名书。任继愈先生指出，“春秋”已被引申为古史的通称，《吕氏春秋》的作者欲博通古今之变，以史典自诩，故自号“春秋”。^②正是对此意的详尽解释。

正因此，学界有责任对吕不韦与《吕氏春秋》的史学活动进行客观全面的考察研究，既肯定其成就，又指出其不足，这不仅是对吕不韦本人及《吕氏春秋》负责，更是对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学发展负责。为此，我通过认真研究撰写了《吕不韦与〈吕氏春秋〉》一书，重点研究论述了吕不韦与《吕氏春秋》在历史编纂学和史学思想上的价值成就及其对后世中国史学发展的影响。

在研究中国史学起源和孔子与《春秋》、吕不韦与《吕氏春秋》史

① 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② 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学成就的基础上,我以春秋战国主要历史典籍《尚书》《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国语》《战国策》等为主,钩稽爬梳,详加论证,撰写了《先秦历史编纂学简论》一文,对先秦时期史书编写的体裁、态度、方法、原则、风格等方面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充分肯定了这一时期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的开创之功和所占的重要地位。

以上是对我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研究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学术路径与学术成果的概要回顾与总结,其中的学术论著,除《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传记》《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评论》两篇论文尚未发表外,其余均已公开出版或发表。为方便史学爱好者研究起见,兹将其结集出版。文中所有观点内容均原样保持,未做任何改动。我相信,读者通过阅读,一定会对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取得的史学成就,特别是这两个时期分别对秦汉和隋唐以降中国史学繁荣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有一个全新的认知。

由于受自身学术见识和研究能力所限,书中的学术观点、分析论证肯定有不当或错谬之处,敬请学界方家同仁批评指正。

李颖科

2017 年 9 月于西安

目 录

上编 春秋战国

论中国史学的起源	(3)
孔子与中国史学	(16)
论孔子的史学思想	(30)
吕不韦与《吕氏春秋》	(51)
论《吕氏春秋》的历史思想	(94)
先秦历史编纂学简论	(112)

下编 魏晋南北朝

孙盛史学初探	(139)
干宝及其《晋纪》	(157)
论干宝在历史编纂学上的贡献	(165)
论干宝的史学思想	(180)
论裴松之的史学思想	(199)
试论《世说新语注》	(211)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传记	(227)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考据	(237)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籍注释	(257)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评论	(278)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事评论	(291)
魏晋南北朝史学中的直书与曲笔	(309)
魏晋南北朝历史编纂学简论	(321)
魏晋南北朝史学思想简论	(350)
魏晋南北朝史学发达原因新探	(384)

上编

春秋战国

